

刘以顺 童志强

外战 中的 内战

春秋出版社

外战中的内战

刘以顺 童志强

春秋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外战中的内战

刘以顺 童志强

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昌平展望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5印张 130千字

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7200 册

ISBN 7-5069-0017-3/K·1

书号:11492·23 定价:1.00元

(国内发行)

前 言

1956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在台湾编著了一本回顾国共关系的书,名曰《苏俄在中国》,又名《和平共存?》。此书通篇充斥着对共产党的诽谤,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①,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只顾发展自己,专门袭击友军,并宣称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破裂和国共两党不能和平共存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而进行的、有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群众及海外华侨参加的一场全民族战争。“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剧和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迫使国共两党各自改变了自己的政策,这才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其中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政策的转变是坚定的、积极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动摇的、消极的。当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国民党能在民族存亡关头以民族大义为重,接受了共产党关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形成,这是适应历史潮流的行动。但是也必须指出,即使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国民党最高当局也并没有真正

^①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86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

放弃过反共的方针。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蒋介石就在庐山训练班提出,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顽固否认国共两党的平等地位,把国共合作说成是政府“开诚接纳”共产党,“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①。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一直不肯真正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合法地位,不肯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除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外的其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甚至当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壮大到52万人的时候,国民党仍然坚持只承认八路军3个师和新四军4个支队,而且还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

于是,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最高当权者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悍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磨擦事件接踵而来。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就是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②

“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③只是由于中共中央制定并领导全党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同国民党顽固势力作斗争时“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④,坚持民族斗争第一,统一团结第一,“不为天下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5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43页。

④ 同上,见第703、708页。

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磨而不裂”^①，才胜利地击退了反共高潮，避免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国共两党的全面分裂，并且把国民党抑留在抗战营垒中，直到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维护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视为处理国共关系的准则，她和她的领袖人物在领导全国人民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三次反共高潮时，正确地把握了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关系，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领导才能，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今天，重温这段历史，认真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的领袖人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思想及其当年的革命实践，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而且，阐明这一段历史的真相，对于正确处理当前的国共关系，推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共赴国难	(1)
(一) 谈判合作	(1)
(二) 团结御侮	(7)
第二章 风乍起	(17)
(一) 山雨欲来	(17)
(二) 惨案迭起	(21)
第三章 黑云压城	(27)
(一) 陇东事件	(27)
(二) 晋西事变	(31)
(三) 三路进攻太行区	(40)
(四) 奋起反击	(44)
(五) 休战言和	(51)
第四章 华中阴霾	(56)
(一) 胡服到华中	(57)
(二) 皖东磨擦	(64)
(三) 陈毅和黄桥决战	(70)

第五章 天低云暗.....(84)

(一) 皓电——佳电.....(84)

(二) 如意算盘.....(90)

(三) 守株待“虎”.....(93)

(四) 急风骤雨.....(98)

第六章 千古奇冤.....(105)

(一) 血染东流.....(105)

(二) 重建军部.....(116)

(三) 两个十二条.....(120)

第七章 两种命运.....(134)

(一) 在《中国之命运》的背后.....(134)

(二) 质问国民党.....(139)

(三) 风浪暂平.....(144)

结束语.....(147)

第一章 共赴国难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导致了东三省广大国土的沦陷,而它对外的不抵抗政策,又更加激发起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狂热的占有欲使日本当局利令智昏地发出了“防备赤化势力的威胁”,“实现日满华三国之合作”^①的叫嚣。在基本稳定了伪“满洲国”的局势以后,日军的铁蹄开始源源不断地踏进了关内。一场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阴云笼罩着神州大地,战火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是战,还是降? 这个事关民族继绝存亡的问题,无法迴避地摆在了炎黄子孙面前,从领袖到庶民,从将军到士兵,从资本家到工人,从地主到农夫,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回答。

(一) 谈判合作

日本进一步的军事压迫,在客观上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束了长达10年的内战。这一点,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始料未及的。

1937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避暑胜地庐山牯岭,国共两党

^①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46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开始了关于两党合作抗日的第三次高层谈判。

——关于军队问题，可以给红军3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3个师仍旧12团编制，人数45000人，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①：这是一口浓重的浙江官话，言词之中含有不容置疑的口吻。

——“现在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商谈合作抗日，而不是向国民党投诚，要国民党收编。”^②另一方操着苏北口音斩钉截铁地作了回答。

对话的双方，前者是中国国民党党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蒋介石，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这一次谈判，除了涉及红军改编的问题外，还涉及两党关系和陕甘宁边区的一些问题。

关于国共合作，蒋介石提出：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指定国民党若干人和由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的人组成，以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一切对外活动及宣传均由同盟会决定，然后两党执行；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同盟会工作如能顺利进行，那么，在条件许可时，它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政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联系，代替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

关于陕甘宁边区领导人的人选问题，蒋介石提出，由国民党派正职长官（可由共产党推荐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荐副职，可由林伯渠担任。

蒋介石还提出，为避免国内外的恐惧和反对，共产党应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第9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避名干实”，不必力争目前不能实现的要求，不要使他“太为难”，以便于将来的发展，等等。蒋介石的中心思想，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边区控制起来，使其不能发展，然后予以吞并。

周恩来据理驳斥了蒋介石的种种谬论。由于蒋介石没有诚意，这次谈判未获结果。

众所周知，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国共双方就通过多种渠道，开始了两党的秘密接触。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内停战，初步和平的局面得以实现，为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派出周恩来等为代表，自1937年2月起同国民党开始了正式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两党关系问题，红军改编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等。谈判中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概括起来是：“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①

第一次正式谈判是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在西安进行的，第二次正式谈判是3月下旬至4月初在杭州进行的。在庐山进行的这次谈判，是国共两党间的第三次正式谈判。这三次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条件苛刻，缺乏诚意，所以都未达成协议。

6月1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反复商讨，为了推动谈判继续进行，决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作必要的让步，提出新方案15点，其主要内容是：原则上同意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但必须先确定共同纲领，只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有在双方一致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才能由双方推选同等数目的人员组成最高会议；蒋介石可以任主席，但他必须依靠共同纲领，才有最后决定权；“国民革命同盟会”不能干涉两党的内部事务，“同盟会”决议如违反共同纲领，任何一方均可拒绝执行；“同盟会”将来的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中共可以不加反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关于红军和边区问题，必须坚持以中共的绝对领导权为前提，始可考虑国民党方面的某些意见。中共将此新方案电告了蒋介石，但蒋介石复电仍坚持原议，致使谈判仍陷于僵持状态。

中共中央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共两党现状，考虑到国内和平虽已初步实现，但由于国共两党代表着截然不同的阶级的利益，双方的力量对比又相当悬殊，在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问题上自然难以达成协议，于是决定争取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便于共产党公开活动，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战。为此，周恩来于7月4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次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与国民党再开谈判。15日，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约定由国民党的通讯社发表。

7月17日，国共两党开始第四次正式谈判。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国民党代表是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谈判地点仍在庐山，故又称为第二次庐山谈判。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表示：中日开战后，宣言即可代表。但他仍坚持红军改编后在3个师上面只设政治部，不设某路军总司令

部或指挥部？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指派。此外，他还想在政治部主任的人选上做文章。周恩来严肃表示，中共决不接受蒋介石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的意见。第四次正式谈判又陷入僵局。

7月20日，周恩来接到张闻天、毛泽东自延安发来的电报：“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①于是，周恩来等人离开庐山，到达南京、上海，一面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一面观察时局变化。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在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编足15000人。在上海，周恩来会见了回国请缨抗战的叶挺，商讨了由叶挺出来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可能性。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与蒋介石进行第五次正式会谈。上海“八·一三”战事发生后，日军全面展开了侵华战争，国民党中央军亦奋起抗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同时他也知道如不让步，红军即将自行改编），遂接受了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军事方面的条件。8月19日，双方正式达成协议，蒋介石答应：红军改编后国民党不委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中一切职务都由中共自行派配。南京谈判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还达成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在这些协议达成的当天，周恩来、朱德即离开南京返回洛川。

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的

^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19页。

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不久又改称总、副司令）。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9月21日，博古、叶剑英和蒋介石、康泽、张冲在孔祥熙的公馆里进行会谈，蒋介石同意发表由博古、康泽代表国共两党签字的宣言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国共产党同时向全国郑重申明，发布这个宣言是“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以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①。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表示国共双方“皆以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②，表示了合作抗日的意愿，从而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从1937年2月中旬起率领中共代表团风尘仆仆地往返于延安与西安、杭州、庐山、上海、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行了持久耐心的谈判，终于最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深有体会地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而且还证明，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③

^① 《六大以来》（上）第84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4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运筹帷幄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看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时，感到无比的欣慰。他在延安窑洞里深刻地指出：“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①

（二）团结御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确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国共两党互相配合，团结御侮，迅速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

应当肯定，在抗战初期，中国国内一度出现了民主、团结的新气象：国民党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了一些长期关押的政治犯，吸收了部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政府抗战工作，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并且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薪饷和部分弹药。这些进步举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扬。还应当指出，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时是比较努力的。

“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日军发起平津战役。至7月26日，平津段铁路已完全被敌控制。同一天，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中国守军负责人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24小时内撤离北平，否则即以武力攻占。蒋介石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5页。

石感到和平解决已无路可走,乃于27日密电宋哲元:“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①28日5时许,日军第20师团主力,在坦克、飞机和猛烈炮火的配合下,向南苑大举进犯。第29军奋起自卫,但是,“南苑由于事先未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营围作掩体,在敌人空军的轰炸扫射之下,部队完全陷于不能活动的地步,且通讯设备又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完全断绝,指挥失灵,秩序混乱”②,苦战终日而伤亡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7月30日,平津相继沦陷。

8月13日,日军又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15日,蒋介石宣布由自己担任陆海军总司令,并着手调动江南各省精锐部队73个师,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淞沪抗战,毙敌6万余人。“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③11月9日,上海失守。

在中国军队组织淞沪战役期间,日本华北方面军于10月发起了忻口战役。10月10日,日军第5师团和察哈尔派遣兵团5万余人猛扑太原。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集中8万兵力设防于忻口附近地区,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日军,阵地失而复得。敌我相持20天,双方伤亡惨重,国民党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均在战斗中以身殉国。最后,由于娘子关失守,

① 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1937年7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记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8页。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97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行,1980年版。

忻口守军腹背受敌，于11月2日被迫撤离。接着，11月8日太原失守。

日军华中派遣军占领上海后，分路推进，于12月13日攻占南京，然后会同华北方面军沿津浦路南北对进，发起徐州战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奉命保卫徐州，确保津浦、陇海两线枢纽，巩固武汉东北战线。1938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李宗仁集中第五战区主力在鲁南台儿庄一带抗击日军第5、第10两个师团。在战斗的核心地域台儿庄，双方军队反复争夺，几进几出。最后，日军被歼万余人。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蒋介石急于求成，调集了更多的中国军队到津浦路中段，企图速战速胜。而日本“大本营看到，在台儿庄方面有大量的中国军队，特别是汤恩伯军的出现，认为给蒋介石军的主力一打击，是挫伤敌人抗战意志的好机会，因此决定进行徐州作战”^①。随之，由于第五战区未能相应组织有效的抵抗，徐州很快于5月19日沦陷。

徐州沦陷后，日军继续挥师推进。6月15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以侵华日军35万人，分别由大别山北麓南下和沿长江两岸西进，合围武汉，控制中原腹地，威逼中国政府投降。武汉保卫战于是拉开帷幕。100万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奋起抗敌，历时4个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10余万。最后，由形势所迫，武汉于10月25日弃守。此前4日，广州亦告失守。至此，半壁江山陷入敌手。

在抗战初期的上述历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虽然一再失利，丧师失地，但它们在正面战场努力抵御日本侵略军的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这些英勇抵抗，给了日军很大的杀

^①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